



试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刘东超)

(2005-5-12 10:38:45)

作者：刘东超

所谓贤人治国，康晓光的说法是：“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可为什么民众这样听话地接受精英的“仁政”呢？“仁政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理由是：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谓之‘选贤与能’或‘贤人治国’。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要求。行为的动机不同于行为的效果，善良的动机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而好的效果只能证明政府具备有效性。”我不知道各位读者读到康晓光这些说法的感觉是什么，我最为直接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怀疑和厌恶：“你不是在公然骗我或和我开玩笑吧？”“你编造的说辞明明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啊！”坦率地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敢对我说康晓光这里的话，我当时就会愤怒地抽他耳光，因为他在侮辱我作为一个当代正常人的智力水平。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听到“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我比你优秀”、“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这类话，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反应。这是因为从传统宗法社会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够了这样的话，看到的却是统治者私心的极度膨胀、私欲的巨大释放，得到的是民脂民膏被搜刮、民智民心被愚闭、民手民足被束缚。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触手可及，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连“漂亮”都谈不上的话呢？事实求是地说，康晓光的这些话还存在许多理论缺欠（比如动机决定论），可即使我们不谈那些，仅靠它们给我们的这种理论感觉就足以导致当代国人思想上的拒斥了。在当代中国，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相信现实政治的效果而不是可以随口漫言的“动机”，这是历史苦难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学习别国得到的经验，还是文明进步给我们的成果，我们怎么可能再放弃这不是最好只是最低的基本理念呢？这是我们基本思想能力的体现呢？如果再放弃这一基本思想能力，我们还将回到被谎言和空话欺骗的状态中去。

所谓父爱主义国家，康晓光指的就是“现代仁政”，他说：“‘现代仁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威主义政府’”，它“必须把‘富民’和‘教民’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尽管儒家不承认主权在民原则，但它坚持民本主义原则，承认大众的社会经济权利”。在此，也许有论者对康晓光所说的政府“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政府必须推行‘教化’”等提法不赞成，但这仅是学术派别不同造成的讨论。在我看来，他在此处的问题之一是语言表述不太让人接受，比如“父爱主义国家”的提法就让当代国人理解不了，因为我们从国家中既看不到“父”、更感受不到“爱”。不仅今天的国家是如此，历史上的国家也是如此；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仅我们实际接触到的国家是如此，理论中能够设想出来的国家也不会发生本质变迁。实际上，即使我们不把国家理解成“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在我们的现实感知中也不过是一套相对来说较为中性的制度和设施，以“父爱”这样富有人情色彩的用词来规定国家与我们的经验不符，也给人以“别有用心”的感觉。康晓光此处的问题之二是“父爱主义国家”的理论前提——民本主义思想已经远远过时。我们说，在几千年前民本思想确实较为先进且具有约束暴君贪官的现实意义，可是在今天民主思想已经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再谈“民水君舟”之类的民本思想既不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人民绝对不再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夺取政权需要依靠或“善待”的一种力量了，他们应该是国家和天下的主人。这在今天已经成为普世常识（虽然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方不能真正实行），民本思想还有什么思想力量 and 现实力量来与之对比竞争呢？康晓光的辩解也许是“民主只是一种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我们说，民主或主权在民仅是人类经过千百次试错和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的法理共识，当然并不是在政治实践中使每个人均匀地分有一份主权。在技术层面上后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并不太大，但不应因此否认民主的法理意义和进步价值。相较之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原则远远不具备这种法理上的近代性、当代性，那么，在当代中国它的被接受度和可能的消极影响都是不容乐观估

计的。因此，以民本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父爱主义国家的提法恐怕也不可能在今天成为政权的合法性理论基础。总结以上三条可以说，康晓光以儒学为当代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方案很难行得通。其根本的理论原因在于儒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前近代的思想学说，其社会本质决定了它对近现代社会具有一种天然的否定力量，康晓光对它的改造也没能消解掉这种力量。因此，对它寄予当代社会合法性基础这样的希望仅在理论上就可能成立不了。再结合上文对于儒教方案的批评性讨论，可以说对儒学成为当代中国新的意识形态的预想是需要再斟酌的，其中的理论障碍是相当巨大且远没有表现出可以消除的迹象来。在我看来，康晓光预想的根本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设计上的高远理想主义和现实政治操作上的公然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漂亮言辞和专制行为的杂烩导致的只能是前者沦为虚伪和无效（自然也就不再“漂亮”），后者沦为强制和横暴（自然也就表现为丑恶），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先例我们看到的还少吗？

另外，在现实层面上，康晓光预想远远不能回应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裹胁和渗透，也远远不能解释和指引当代中国强大的市场化运动，至少在目前也没能找到较好的处理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的模式。从根本上说，这 and 传统儒学较为狭隘的视野、较为粗糙的理论能力有关，也和近现代儒学没能完成现代转型有关，还和某些以儒自诩自期的论者宣称过多、建构不足有关。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这些现实障碍并非不能有所消除，但这必须建立在儒学根本性的改造、变革和建构基础之上。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关闭窗口\]](#)